



氐与羌

马长寿 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31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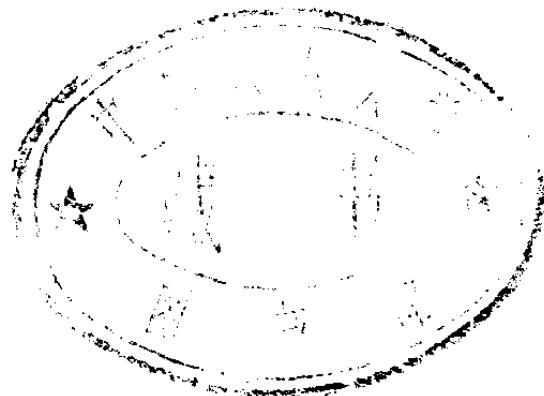


1143078

氏 与 羌

马长寿 遗著

203116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顾孟武
封面装帧 甘晓培

氏与羌

马长寿 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49,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

书号 11074·567 定价 0.63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氐、羌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1
二、自古以来氐、羌就是关系密切的两个民族	9
三、徙、祚都、冉駩非氐，吐蕃非羌	23
第二章 氐族	32
一、氐族的起源、分布和移动	32
二、齐万年的起义和失败	44
三、前秦和后凉，兼论苻坚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	
	50
四、仇池氏杨氏所建的几个地方政权	61
五、秦、南秦、东益、南岐、东秦、沙诸州的氐、羌等族人民起义	66
第三章 羌族	90
一、羌族的起源、迁徙和汉代西羌部落名称及其分布	90
二、两汉对西羌的压迫剥削和东汉时东西羌的五次起义斗争	111

三、魏、晋、十六国及北朝时雍、秦、凉、益四州	
羌族的历史	146
(1) 凉州河湟地区羌民在各种政权统治下所进行的城镇及桥梁建设	147
(2) 秦州地区的羌中、宕昌、邓至等羌族	156
(3) 益州西北部的羌族	166
四、隋、唐、吐蕃等对羌族的统治	181
五、文献所记古代羌族的社会经济文化	196
后记	220

第一章 緒論

一、氐、羌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氐和羌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氐和羌都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十一世纪中国奴隶社会的商代，他们就先后出现于历史记载。到了隋、唐时期，氐族已逐渐汉化了，羌族中居住在秦、陇地区的逐渐融合于汉，河湟地区的逐渐融合于藏，可是还有一小部分居住于四川西北岷江上游的仍为羌族，屡世绵延至今，它和汉族的历史是同古同今的。

不仅如此，除了人口最多的汉族之外，古代氐、羌活动的地域可算是中国古代民族当中较为广大的。特别是羌族，自古以来从今河南一直向西，到今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向南直到今四川西部和南部，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他们不仅与中原地区，而且与北方蒙古草原、西南的青藏高原、西部的天山以南等地区的各个民族，均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因此，正如有的同志所说：不搞清氐、羌史，要研究西北和西南各民族的历史是很困难的。

第二，氐、羌起源于西方，很早就因各种原因不断地徙入中原，同汉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因此，不论从政治、经济，或

者从语言、文化上说，他们与汉族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更重要的是，在封建时代，他们同汉族人民共同进行了无数次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他们又同汉族人民一道进行了英勇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氐、羌和汉族人民始终是同命运，共患难，在反抗共同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联系更加紧密；氐、羌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氐、羌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他们同我国其它民族一道开发和建设了祖国的西北地区。三国时，鱼豢在《魏略》一书中记：氐“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①。羌族早时以畜牧、射猎为业，战国以后，便兼营田畜。汉代时，羌民所在的河湟及洮河地区不只开土成田，而且开渠灌溉，种植稻禾。迁到中原内地的羌民也都以播种麦、麻，饲养家畜为业。因此可知，不仅氐、羌的分布中心区，如白龙江、西汉水流域，黄河上游及湟河、洮河流域的土地是氐、羌人民开辟出来的，就是他们迁徙所至的土地，例如关中渭河以北的陕北、宁夏南部、河西走廊、嘉陵江上游、岷江上游的全部或一部分土地，也是由氐、羌劳动人民所开拓，或氐、羌与其它族人民共同开辟出来的。他们不只在那里开垦荒土为耕地，种植五谷，饲养家畜，而且在那里修建桥梁，建设村落，繁荣城镇。所以，必须认识到西北地区和一部分中原地区是由氐、羌劳动人民开拓的，其中许多文化是由氐、羌人民创立的。

第四，氐、羌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建立过一些政权。如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氐族苻氏为首的前秦政权，以氐族吕氏为首

①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

的后凉政权，以羌族姚氏为首的后秦政权，还有以仇池为中心由氐族杨氏所建的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等。这些政权的内部主要是汉族，不是氐或羌，而且它们存在的时间较短，少者十多年，多者几十年。尽管如此，他们所建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仍然发生过影响。例如氐族苻氏所建的前秦，在十六国分裂混乱的局面中，几乎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有力地促进了北方各个民族的融合；它还保存了一部分传统的中原汉族文化，使北方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小康局面。又如氐族吕氏所建的后凉，它的势力达到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等地，这对于加强中国西北与内地的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氐、羌人民在更长的时期内是受其它各族统治阶级的统治。氐、羌受中原汉族统治阶级的统治时候最多，如在周秦时、两汉三国时、西晋和隋唐时，都是如此。在五胡十六国时，氐、羌受苻秦、姚秦、吕凉统治外，又受过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胡石氏、成汉寰人李氏、西秦鲜卑乞伏氏、南凉鲜卑秃发氏、北凉卢水胡沮渠氏、前凉汉族张氏等的统治。到南北朝时，氐、羌或受北朝拓跋魏或北周宇文氏的统治，或受南朝汉族宋、齐、梁、陈的统治。此时，氐、羌处南北两政权间，忽而事北，忽而事南，跟着各族首领的利害而定。而河湟之羌则又在游牧部落吐谷浑政权的统治下，受其支配，或随牧主游牧，或为主战，原来已经有所发展的农业经济至此又变为游牧生活了。唐代中叶，吐蕃北上，驱逐吐谷浑而占领河湟及西川的一部分，此地区的羌人又受吐蕃的统治。

不论氐、羌受那一族统治阶级所统治，他们都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受到民族歧视和排挤。因此，他们不断

掀起了反抗各族统治阶级的斗争，有时这种斗争是氐、羌人民单独进行的，有时又是他们与其它族被压迫的人民联合举行的。这些起义斗争，虽然带有更多的民族斗争的色彩，但本质上仍然是阶级斗争。氐族最大一次起义发生在晋元康六年（296年），起义军包括了氐、羌及卢水胡等，但氐族齐万年是这次起义的领袖。羌族在东汉时，也曾不断掀起反抗统治者的斗争，其中主要的共有五次，一次比一次规模巨大，一次比一次进步，可以说整个东汉的国运是和羌民起义相始终的。总之，历史上氐、羌人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起义斗争贯穿着他们整个历史，这些英勇的斗争为中国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五，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氐族基本上融合到汉族之中，羌族的大部分也融合于汉族。即是说，现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多的汉族内，有一部分是由原来的氐、羌族融合而来的。而现代中国三百多万的藏族内，也有一部分是原来羌族融合而来的，例如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及青海的一部分藏族就是如此。

氐族由于其原始居地与汉族接近，迁徙亦较频繁，因此很早以来，氐、汉人民就处于错居杂处的状态，经过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就基本上汉化了。羌族的汉化和藏化时间较长，而且也很复杂^①。大致言之，历史上羌族之融合于汉族，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此之前的夏商之际，就有大批的羌民进入中原，建立了一些小的国家，如吕国、申国、许国等。以后，羌族又陆续迁入陕西、河南等

① 还有一部分居于今新疆南部的羌族，可能后来融合到维吾尔族之中，由于资料阙如，故暂且不论。

地。这些在秦以前陆续迁入中原的羌族，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时，已经基本上融合到汉族之中。第二次是在魏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处于分裂混乱的局面，许多部族迁入中原，氐、羌也是其中之一。经过这一时期民族的大融合，因各种原因迁徙到陕西、甘肃东部及河西的部分羌族，也逐渐汉化。第三次是隋唐时期。此时秦陇地区的羌族进一步融合于汉，河湟及四川西北一部分羌族逐渐融合于藏。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中叶，因吐蕃北上，原在四川西北的党项羌及其统治下的部分羌族被唐朝迁徙到河套一带，至宋时建立了西夏政权。于是唐代以后，今河套以南，宁夏、甘肃东北又有了许多羌族部落^①。其次，唐末吐蕃衰弱，张议潮收复河陇之地，但不久这里即为回鹘、吐蕃及其奴部喝末、龙族和羌族所据。这从敦煌石室出土的遗书可以看出，如斯坦因从敦煌劫去的咸通九年（868年）刻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贴里的文书就记：“河西诸州，蕃（吐蕃）、浑（吐谷浑）、喝末（吐蕃奴部）、羌、龙（焉耆人）杂处，极难调伏”^②。《敦煌石室遗书》第一册《张氏勋德记》残卷亦记：“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喝末雷威潜伏”。唐光启元年（885年）书写的《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内，记伊州（治今新疆哈密）有“羌、龙杂处，约一千三百人”^③。由此可见，唐末河西地区又徙来不少的羌族

① 如《宋史》卷二九二，《郑戬传》云：在今甘肃天水、庄浪一带有“生羌大王族”部落等。

② 转见羽田亨：《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考》，载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③ 载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丛考》，第77页。

部落，一直到宋初凉州等地仍有不少的羌民^①。以上两地的羌民直到宋代以后才逐渐融合到汉、藏之中。

历史上民族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例如氐族，虽然我们说它融合于汉族大致是在隋唐时期，但事实上，唐代以后在我国西北地区仍然有聚居的氐族部落存在。如《续资治通鉴》卷六四，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记：在今甘肃庄浪南水洛镇一带，“杂氐十余落，无所役属”。至于羌族之最后融合于汉、藏，时间更为长久，直到明代，仍见文献或碑石上有许多关于羌族的记载。如洮河流域的岷县有明万历年间张益谦撰《洮岷边备道题名碑》，内记成化四年（1468年）和正德六年（1511年），该地均发生过“羌叛”的事件^②。可见洮水流域的羌族在明代还没有完全融合于汉族。

从古代氐、羌融合于汉、藏的历史，我们可以摸索到我国阶级社会里民族同化、融合的一些途径和规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贯穿在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各族融合的途径主要有两条：

一是因民族的迁徙，造成各民族错居杂处的局面，这就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试观历史上羌族的几次大融合，均是因羌族不断迁徙到关中、河南、甘肃等地，与当地人口众多的汉族错居而较快完成的^③。古代的民族迁徙，有时是

① 现存武威的西夏文、汉文合璧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汉文部分记载，西夏昭简文穆皇后梁氏专政时（宋元祐初年），有“西羌梗边，寇乎凉土”。

② 张维：《陇右金石补录》卷一。

③ 关于氐、羌在关中与汉族融合的具体情况，参考拙作《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即由中华书局出版）。

迁徙民族因自然条件或其它原因自动进行的，也有时是统治阶级强迫实行的。而迁徙的民族大部分是少数民族，但也有人口众多的汉族向少数民族居住地迁徙。不论迁徙的性质或形式如何，它都为民族融合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二是作为统治民族的上层在被统治民族聚居地区推行同化政策，促使这里的民族融合于他族之中。如历史上各族统治者在氐、羌或其它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征收赋税，推行本民族传统的文化、习俗、语言等等。当然，历史上统治阶级这一套同化政策，往往带有强迫性质，这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引用一方宋代羌族聚居地之一的洮水流域岷县西广福寺所存留的碑石。此碑名《广仁禅院碑》，立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八月十四日，王钦臣撰文，周环书，张若纳立石，荔非恭刻字^①。碑文叙述宋熙宁六年（1073年）收复洮岷后，“乃敕数州（即岷、熙、河、叠、宕等州），皆建佛寺”。九年，种谔知岷州时，始在岷州建广仁禅院。文中叙述了建寺的经过，并讲述了建立这个寺院的目的。文云：

“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部人之多寡，推择其可奉佛者，使其为之诵贝叶傍行之书。……虽然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非中土之教为之开示提防，而导其本心，则其精诚直质，且不知自有也。传曰‘用夏变夷’，信哉其言乎。”

显然，修建广仁禅院是为了用佛教来改变当地羌民的习俗，“用夏变夷”，这个“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同化”。碑石

^① 碑全文见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三。此碑刻字者“荔非恭”，也为一汉化之羌人。荔非，古羌姓（见《通志·氏族略五》）。

开首所云“变革之道，诗书礼乐之外，盖有佛氏之道大焉”，也就是这个意思。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碑文还提到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同化少数民族的办法，云：

“恭惟圣主之服远也，不以羁縻恍忽之道待其人，必全以中国法教驭之。故强之并弱，大之凌小，则有甲兵、刑罚以威之；擅山泽，专障管，则或赋或禄以易之；鸟兽惊骇，则文告期会以束之；闲田沃壤，则置兵募士以耕之；书劳告勤，则金帛爵命以宠之；争讼不决，则置吏案法以平之；知佛而不知戒，则塔庙尊严以示之；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必世而后仁，尽在于是矣。”

文中提出的“中国法教”，包括了军队、刑法、赋役、宗教、诗书等各方面，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正是用这些“法教”来同化少数民族，汉族统治者对氐、羌及其它少数民族如此，吐蕃王朝对羌族同样也是如此。

无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通过上述哪种途径，最后被融合的民族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低于融合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水平。即使被融合的民族是统治民族亦如此。关于此点，我在前几年曾提出过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条基本规律，即“归根到底还是被融合者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升到融合者当时具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水平问题”^①。我想，古代氐、羌之融合于汉、藏，也基本上是符合这一基本规律的。

下面在正式叙述氐、羌历史之前，先就有关氐、羌史上一

① 拙著《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5 页。

些长期以来被人们搞混乱了的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二、自古以来氐、羌就是关系密切的两个民族

我国古代的西北方，部落、部族虽然众多，但大致可分为汉藏语系的民族和阿尔泰语系的民族两种。一般的说法，北狄属于阿尔泰语系，西戎属于汉藏语系，此说大体上可以成立。以此为前提，《史记·匈奴列传》把先秦时的一些西戎叙述在匈奴传的前面，我觉得问题很多。反之，《后汉书·西羌传》把同样的一些西戎叙述在西羌传的前面，虽然许多西戎并非西羌之祖，但在语言分类上是比较妥当的。

古代的氐和羌都是西戎，都居住在西方，又同属汉藏语系，关系密切自不待言。所以在汉文古籍中，经常以“氐羌”绵连的形式出现。例如《诗经·商颂》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记成汤与武丁时，两次“氐羌来宾”。《逸周书·王会解》亦记周成王时，“氐羌以鸾鸟”来献。关于最后一条，晋孔晁注云：“氐羌，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把氐羌释为氐地之羌，混两族为一族，是不合于历史事实的。西羌在汉景帝时，始东迁于陇西的氐道等地^①。成周之时，哪里就有了氐地的羌呢？所以氐与羌自古以来便是两族，不能混而为一。

氐族的原始分布地在甘肃的东南部，汉武都郡一带。《北史·氐传》云：“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秦、汉以来，

①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此虽后人追溯之辞，实与历史事实相近。最早文献叙述古代氐族分布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

“自冉駩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汉代的冉駩即唐代的嘉良夷，近代称之为嘉戎，在茂州的西境。此点容于后面详述。自此以东北，包括西汉水、白龙江流域及涪水之上游，都是古氐原始分布所在。古代氐族在此部落众多，有十多个^①，以白马氐为最大。白马氐的所在，据《括地志》考证在陇右的成州（今甘肃成县）和武州（今甘肃武都），此为古氐分布的中心。由汉至魏，武都的氐人虽不断外徙，但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记：武都、阴平之氐尚有一万余落，可知三国时古氐的中心仍未改变。西晋时氐在关中已经定居，江统著《徙戎论》，建议“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并谓此为“各附本种，反其旧土”^②。那末古氐的原始居地何在，可以不言而喻了。

《史记》和《汉书》对羌族的起源地都不曾加以叙述。但从其中有些纪传仍然可以看到古羌分布的踪迹。《史记·秦始皇本纪》述秦代的疆域云：“西至临洮、羌中”。同书《大宛列传》又述：“匈奴右方居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秦代的疆域，西至临洮，包括后世的洮、岷二州地^③，二州以西并为羌族所居，故称之为“羌中”^④。从

① 杜佑《通典》卷一八九，《氏传》称：“君长数十”，恐系“十数”倒置之误。

②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③ 唐魏王泰《括地志》卷八（辑本）云：“临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又云：“秦陇西郡临洮县，即今岷州。”（岱南阁丛书本）

④ 同上书云：“羌中，从临洮西南芳州（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扶（今四川文县西北）、松（今四川松潘县）府以西，并古诸羌地也。”

《秦始皇本纪》可以看出，洮岷二州是古羌的东界。陇西郡的临洮县在秦代是长城的起点^①。匈奴的疆域，从罗布泊以东，经河西走廊至秦陇西长城的北面，其南与羌地相接。所以古代的羌人分布在河西走廊之南。以此再与《汉书·西域传赞》参照，其义更明，传赞云：“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月氏初居河西，匈奴逐之西迁。汉武帝又驱逐匈奴，置河西四郡。羌在四郡之南，班固遂称之为“南羌”^②。从上述诸条，便可看到古代羌人的分布在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

《史记》、《汉书》都没有提到古羌分布的中心。首先提出西羌分布中心的，是西晋时司马彪的《续汉书》，内云：

“西羌自赐支以西，至河首左右，居今河关西，可千余里，有河曲。羌谓之赐支，即析支也。”^③

河关在兰州西南，以西千余里为河曲。黄河自西来，至大积石山脉东南端，曲而西北行；经小积石山的东北麓，又曲而东北行；至曲沟，又曲而东行，凡千余里，皆称河曲，羌语称之为“赐支”。二十多年前，我曾往四川汶川、茂县等地调查羌语，今日羌人仍称河曲为“赐支”(slitsi)，并言其远祖自赐支迁来。《续

① 《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

②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本有“南山羌”之名。汉人称河曲之南的祁连山为南山，南山羌之名由此。但不只南山中有羌，南山之南羌人更多，故有“南羌”之名。

③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记。所记《续汉书》此段似本于汉应劭，云：“《禹贡》析支属雍州，在河关之西，东去河关千余里，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也。”(《水经注》卷二引)

《汉书》谓自河曲以西，至河源，皆为西羌所居^①。河曲及其西岸和北岸都是西羌分布的中心。按《汉书·赵充国传》和《后汉书·西羌传》皆言：西羌诸种分布在河曲附近及其以西以北诸地。《西羌传》谓：西羌始祖无弋爰剑畏秦之威，“亡入三河间”，诸羌共畏事之。此三河，李贤注以为即黄河、赐支河、湟河。黄河上游在析支之西，湟河在析支的北面。西羌最著名的部落集团：一曰先零，二曰烧当，三曰罕开（又记作“开”）。先零羌的分布在河曲北岸的大、小榆谷（今青海贵德县东）。烧当羌在其西，亦傍河曲北岸，《西羌传》所谓“世居河北大允谷”^②是也。罕开羌初居于鲜水之阳，即青海湖的北岸。后徙至枹罕（旧河州，今甘肃临夏市）西之广大坂，在黄河南，《赵充国传》所谓“河南大开小开”即指此。其它诸羌亦在河曲及其以西各地。江统《徙戎论》云：“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并谓如此则“各附本种，反其旧土”。江统此论也可帮助我们理解古羌的原始分布中心在河曲及其以西以北各地。

从上述氐与羌的原始分布，特别是分布的中心，便可看出，古代氐族分布在甘肃东南部的西汉水、白龙江流域，古代羌族分布在青海东部的河曲及其以西以北等地，两族的原始分布地相距甚远，不能把他们混为一谈。

①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云：“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其言本于《续汉书》上引文。然《续汉书》的文义谓，由河关至河曲可千余里，与上注引应劭文同义。而《西羌传》羌之分布绵地千里，互不相同。

② 允谷疑即允川。《水经注》卷二，《河水篇》云：“河水自河曲又东，径西海郡南。河水又东径允川，而历大榆、小榆谷北”。又《通鉴》卷四八，胡注云：“《水经注》曰：允川去赐支河曲数十里，在大、小榆谷之西。”